

清前中期传教士通事 群体及其角色功能

陈宝良 刘国敏

内容提要 17—18 世纪，缺乏通晓西方语言通事的清廷，常临时聘任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为通事。这些传教士通事具有多重身份，斡旋于中西关系中，扮演着译员、“外交使节”和顾问等多重角色。同时，他们还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桥梁：他们既翻译编纂西学论著，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又译介中国典籍，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等情况的论著，对欧洲启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清代前中期 传教士 通事 中西交往

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开辟了新航线，实现了中西往来通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并试图与清王朝建交，实现自由贸易和宗教传播等；而与清王朝相邻的俄罗斯则穿越西伯利亚，推进到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中俄之间在不断地摩擦中建立了外交与贸易往来。在中西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在华传教士因通晓多门语言，常被临时征用为通事，负责翻译与沟通，成为中西交流的媒介。目前国内学界除对个别传教士通事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徐日昇(Thomas Pereira, 1645—1708)关注较多外^{〔1〕}，对清代前中期传教士通事这一特殊群体的专论相对较少，大多只在有关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中略有提及^{〔2〕}。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行“通事”之职的传教士进行详细梳理，并就传教士通事这一群体在中西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加以阐释，进而分析通事活动的原因及其影响。

〔1〕 [美]魏若望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下简称《鲁汶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李雷《论西方传教士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 如张西平在《跟随利玛窦来中国：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的第1章第4节《中华帝国的外交官们》中，主要论述了顺康年间的传教士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南怀仁、张诚、徐日昇、白晋等人在中西外交上的作用与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王宏志在《翻译与文学之间》一书的第1章第3节《“已转化为中国人的欧洲人”：清廷的传教士译者》中，则概述了顺康时期的传教士通事，并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马戛尔尼使华中的传教士通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一 传教士通事及其人员构成

“通事”一称，最早见于《周礼》“掌邦国之通事而结其好”之语。其后通事一称多有变迁。诸如：先有“象胥”一称，自汉以后，出现了“译官令”“译史”“译官”等职位；唐朝末年或辽宋初年，废“舌人”“译者”之称，将舌人改称“通事”；金代已将口译与笔译分开，口译称通事，笔译称译史；元朝一仍金时之旧，设译史、通事二职为流官，并称口译人员为“怯里马赤”；明代专设“四夷馆”以培养翻译人才，馆中设有译字生、通事，明朝通事并不专指口译人员，亦兼及笔译^①；清承明制，顺治元年(1644)，改“四夷馆”为“四译馆”，乾隆十三年(1748)，四译馆并入会同馆，更名为会同四译馆。官方所设通事，主要负责清与朝贡国之间的交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贸易往来的增多，在清代的广州、澳门地区，形成了新的通事团体，负责中国与海外贸易中的翻译、传达政令和监督外商等多种事务^②。

(一) 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

16世纪初，葡萄牙率先开辟通向远东的新航线，逐步垄断新航线的贸易。16世纪末，葡萄牙国力衰退，荷兰人首先向葡萄牙在亚洲的霸权发起挑战，英国也随之加入这一行列。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官方接触成为葡萄牙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③。但直至明亡，这几个国家均未能打破明朝的朝贡体系，与中央政府建交。清朝时期，葡萄牙、荷兰、英国及罗马教廷等多次派遣使团入华，寻求对话并拓展贸易等。与清王朝相邻的俄罗斯亦曾就边境划定、贸易等事宜，与清廷有着频繁的外交往来。

“西方扩张从来是贸易、战争、传教三位一体的。”^④率先在华扎根的是耶稣会士。他们采取适应中国文化的政策，结交中国皇帝、上层人物和士人。活跃在明宫廷和士人之中的传教士有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邓玉函、汤若望等。清军入关后，汤若望等人转而为清廷效力，并继续在华传教。清康熙时期，出入宫廷传教士有南怀仁、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徐日昇、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3—1741)、戴进贤(Ignatius Kögler, 1680—1746)等。他们或任职钦天监，或担任帝师，或勘测地理、绘制地图，或制造各种仪器等，运用各自所长为清廷服务，以求得皇帝庇护能够在华传

① 孙虎《明代通事笔译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2—159页。

② 关于通事一称的梳理，可参见前揭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第5页；姚从吾《辽金元时期通事考》，载《姚从吾先生全集》，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第5册第13页；乌云高娃《古代东亚“译语”考——兼论元明、朝鲜“译语”意义之演变》，《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前揭孙虎《明代通事笔译考》，第152—159页；王静《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26页。

③ 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85页。

④ 周宁《〈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发现的世纪〉总译序》，载[美]唐纳德·F·拉赫著，周云龙译《〈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发现的世纪〉》第1册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教。雍、乾时期，清廷实行禁教政策，但北京一直留有传教士服务于宫廷，如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刘松龄(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 1703—1774)、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索德超(José Bernardo de Almeida, 1728—1805)、贺清泰(Louis Poirot, 1735—1814)等。除耶稣会士外，还有其他修会成员在宫廷服务，如虔劳会的马国贤(Matteo Ripa, 1692—1745)，味增爵会的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 1671—1746)，遣使会的罗广祥(Nicolas-Joseph Raux, 1754—1801)等。

(二) 传教士充任通事的原因及其人员

清代前中期，主要的外交政策仍承袭明朝的朝贡体制，由四译馆负责外交往来文书的翻译。在中西交往中，语言是彼此沟通的重要一环，但四译馆的通事并不通晓西方语言。而在宫廷服务的西洋传教士，除熟悉拉丁语外，大多还通晓几门西方语言，且能熟练使用满文、汉文，于是便常被征用为通事，偶尔也临时被授予头衔，充任译员，往来迎接使臣，或受命担任使节等。来华使团虽有自身携带通事者，但这些通事在通商贸易中充任简单翻译尚可，却无法胜任外交场合的翻译事务。如1686年荷兰使团入华曾带通事弗莱廷格尔(Frans Flettiger)，但他仅会说闽南语，清廷官员听不懂他的话，于是只好派南怀仁为翻译^①。

传教士之所以利用语言优势，极力介入中西交往中，实则与其自身利益有关。他们为宫廷服务，充当清廷与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最终目的是为获得在华自由传教的许可。如传教士介入中俄外交中，不仅是为摆脱葡萄牙的控制，还为开辟一条经由俄国来华的陆上通道。需要说明的是，中俄间外交语言选择问题，拉丁文并非中俄间唯一可沟通的语言。不仅清廷中人熟知蒙文，且有被俘的阿尔巴津人被编入镶黄旗；而且俄国人中有与外贝加尔区的布利亚特人接触的，也当识蒙文，“可是，不知道是由于俄国人的无知，还是由于耶稣会教士阴谋的结果，最后却选中了拉丁文”^②。康熙十五年(1676)，俄国人尼果赖使华时提出：“嗣后中国大皇帝若行文，请兼写满文、拉丁文。我国若行文，亦兼写俄罗斯文、拉丁文。”^③康熙皇帝依其所请。《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俄方曾提出直接用蒙语跟中国使团交谈，但遭到了传教士的激烈反对，最终仍以拉丁文为媒介语。

在中西交往中，并非在京的所有传教士都能担任通事，除语言要求之外，传教士通事还需“熟知地名、蒙古游牧部落以及在中俄边境之间居住的各个小鞑靼王公的特殊名称”^④。且传教士通常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翻译出相应的内容，经常是头一天夜里接到任务，第二天早上就得把它翻译完毕^⑤。此

① 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载前揭魏若望编《鲁汶论文集》，第313页。

② [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21—27页。

④ 《耶稣会士钱德明神父致科学院德里斯勒(de l'Isle)神父的信》，载[法]杜赫德编，吕一民、沈坚、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⑤ 参见《耶稣会士钱德明神父致科学院德里斯勒(de l'Isle)神父的信》，载前揭《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72—73页。

外，还需得到清廷信任。清代前中期，担任过通事的传教士主要有汤若望、利类思(Lodovico Buglio, 1606—1682)、南怀仁、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1669—1712)、张诚、徐日昇、白晋、利国安(Jean Laureati, 1666—1727)、巴多明、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 1655—1720)、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薄贤士(Antoine de Beanvollier, 1656—1708)、沙国安、龙安国(Antoine de Barros, 1664—1708)、陆若瑟(Raymond-Jeseeph Arxo, 1659—1711)、艾逊爵(Joseph-Antoine Provana, 1662—1720, 又名艾若瑟)、麦大成(Joan Francisco Cardoso, 1677—1723)、戴进贤、马国贤、德理格、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1663—1738)、喜大教(Nicolas Giampriamo, 1686—1759)、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李若瑟(José de Pereira, 1670—1731)、罗本多(Benedetto Roveda)、穆敬远(Joao Mourao, 1681—1726)、张安多(Antonio de Magalhães, 1677—1735)、罗佩思(Cajetan Lopes)、刘松龄、索德超、安国宁(Anoré Rodrigues, 1729—1796)、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 1751—1808)、贺清泰、罗广祥等[表一]。

〔表一〕清顺、康、雍、乾时期主要外交事件及其通事一览表

时间 ^①	使团	通事
1656年	俄国派遣巴荷夫(Feodor Iskowiz Bachoff)来华，于1656年3月抵达北京。因拒行下跪之礼，未得觐见皇帝。	汤若望
1656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侯叶尔(Pierre de Goyer，又译作杯突高啮)和凯塞尔(Jacques de Keyser，又译作惹诺皆色)为使节，率领使团入华。	汤若望
1667年	巴达维亚当局派遣彼得·范·侯尔恩(Pieter van Hoorn)率领使团来京。	不详
1670年	印葡总督库尼亚伯爵(Joao Nunes da Cunha)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派遣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亚(Manuel de Saldanha，清朝旧译玛讷撒尔达聂)率领使团访华。	南怀仁、利类思
1676年	俄国派尼果赖携带魏牛高和法沃罗夫等人，出使北京。	南怀仁
1678年	澳葡当局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派遣白垒拉(Bento Pereira de Faria，又译作本多白勒拉)率领使团携狮子进京。	南怀仁、利类思
1686年	巴达维亚当局决定派使节文森特·巴兹(Vincent Paets，中文史料记载为“宾先吧芝”)入华。	南怀仁
1686年	康熙皇帝委托回罗马的闵明我带一封信给沙皇。	闵明我
1689年	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	张诚、徐日昇
1693年	俄彼得大帝派使臣伊兹勃兰特—伊德斯(Isbrants-Ides)使华。	张诚、徐日昇
1693年	康熙帝命白晋返回法国召传教士，同时命其携带物品赠送给路易十四，内有北京精印书籍49册。	白晋
1705年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派大主教多罗使华，调查并解决“礼仪之争”。	白晋、利国安、巴多明、纪理安、安多、薄贤士
1706年	康熙帝命白晋、沙国安携带礼物，前往罗马答聘。后因多罗的态度，二人抵广州后，被康熙帝召回。	白晋、沙国安
1706年	康熙帝选薄贤士、龙安国一同奉使赍诏书赴罗马。1708年1月20日，两人在途中遭难。	薄贤士、龙安国
1707年	康熙帝又派陆若瑟、艾逊爵二神甫呈递诏书于教皇。两人历经磨难，终至欧洲，教宗接待了两人，但并未对诏书内容有所重视和答复，两人亦在欧洲病故。	陆若瑟、艾逊爵
1710年	印葡总督高世达选耶稣会士麦大成作为国王特使入华。	麦大成
1715年	俄彼得大帝派加尔文(Thomas Garvin)与朗克(Laurent Lange)等人使华。	巴多明
1720年	俄彼得大帝派伊兹麦洛夫(Léon Vassilievitch Izmailow)、朗克等人入华。	戴进贤、马国贤、巴多明、范罗思(中国人)
1720年	澳门议事会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遣使臣斐拉理(Onorato Maria Ferraris)赴京。	不详

① 此表所记时间为来华使团抵京时间或清廷派遣使节离京时间。

(续表一)

时间	使团	通事
1720年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任命大主教嘉乐(Carlo Mezzabarba, 1685—1741)为出使中国及附近国家的特使。	马国贤、德理格、雷孝思、喜大教、冯秉正、李若瑟、罗本多、白晋、穆敬远
1721年	康熙帝听从穆敬远的建议, 派遣张安多出使葡萄牙, 偕大主教嘉乐同返欧洲。同年二月, 康熙帝派喜大教携带《嘉乐来朝日记》由莫斯科一路赴罗马。	张安多、喜大教
1727年	葡萄牙国王派遣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Menezes)为使节, 偕同以清朝使节身份赴罗马并准备返回中国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张安多来华。	巴多明、张安多、罗佩思
1727年	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	巴多明、宋君荣
1729年	雍正帝派遣使臣去俄罗斯。	俄方翻译, 中方未派遣
1753年	葡王派遣的巴哲格(Francisco Xavier Assis Pacheco Sampaio)使团入华。	刘松龄(赏三品头衔)、许方济(中国人)、宋君荣
1767年	俄卡特琳二世派克罗波托夫(Kropotov)来华, 修改《恰克图条约》。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俄方所派)
1793年	英国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华。	索德超(赏三品头衔)、安国宁、汤士选、贺清泰(赏六品顶戴)、罗广祥、德天赐

二 传教士通事的角色功能

细究清代前中期传教士通事的职能及其作用, 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是在中西外交往来事务中扮演通事的角色, 诸如担任译员、充当顾问与调停者、出任外交使节等; 二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扮演使者的角色, 或出任外语官学中的洋教习, 或充当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使者。

(一) 中西外交往来的通事

1. 担任译员

传教士通事最基本的职能是在中西往来中担任译员。来华使团在京期间活动多由传教士居中传译, 包括陪同大臣接待使团, 翻译谕旨, 传达谕令, 翻译使团呈送表文或国书等。如俄国尼果赖使团于1676年5月15日到达北京, 南怀仁先陪同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去拜会俄使, 与尼果赖用拉丁语交流。6月5日, 尼果赖呈交由俄文、拉丁文、蒙文所写国书, 康熙帝先命南怀仁口译, 后又交由南怀仁笔译, 呈交内阁。尼果赖所提谈判议案与清廷所给答复亦均由南怀仁翻译。同时, 在中俄条约签订过程中, 张诚、徐日昇等作为中方谈判译员, 负责向使团传达中方意愿。除在使团驻华期间担任译员之外, 传教士通事还要负责中西方往来文书的翻译, 尤其是中俄之间的文书。南怀仁、张诚、徐日昇、纪理安、巴多明、戴进贤、白晋、宋君荣、孙璋(Alxander de la Charme, 1695—1767)、方守义(J. - F. - Marie-Dieudonné d'Ollières)等都曾负责中俄往来文书的翻译。据不完全统计, 仅从康熙十五年(1676)到雍正八年(1730), 中国方面由耶稣会士从拉丁文译成满文或从满文译成拉丁文的中俄外交文件多达110件^{〔1〕}。

〔1〕 前揭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 第308页。

清前中期传教士通事群体及其角色功能

123

2. 顾问与调停者

传教士通事除担任译员外，还常担任顾问。利类思、南怀仁、安文思曾为康熙帝编译《西方要纪》一书，以供皇帝垂询。1729年，雍正皇帝派遣使团去俄罗斯之前，曾多次向巴多明、宋君荣咨询俄罗斯的国情，如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利益、莫斯科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俄罗斯的历史等，并让巴多明讲说欧洲各国接待使臣的礼节，让宋君荣画出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路线等。

同时，传教士通事还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中西双方就“进贡”与觐见礼仪等有过多争议，多由传教士通事居中调停。如1726年，葡萄牙麦德乐使团来华时，反对以“进贡”的名义进京，怡亲王胤祥对此专门询问巴多明“进贡”一词在欧洲的含义，巴多明则认为“进贡”两个字不好，难以体现使者的身份。最后该使团以“进贺”名义觐见。在如何交付国书时，葡使不愿按中国惯例，将信放在皇帝接见的宫殿中的一张桌子上，要求把信呈交到中国皇帝手中。亲王对此十分恼怒，认为葡使是就一张桌子制造事端，巴多明、张安多又从中加以斡旋，最后使觐见双方都很满意^①。

在两次中俄条约签订过程中，传教士通事都极力周旋，力图和平解决中俄边界问题。如《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甚至有动兵的危险，经张诚、徐日昇的居间调停，中俄最终签订了协议。对此，索额图曾说：“非张诚之谋，则和议不成，必至兵连祸结，而失其好矣。”^②

3. 外交使节

康熙朝，皇帝曾六次派遣传教士作为使节赴欧洲。尽管其中四次未能完成使命，却体现了康熙帝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所做的努力，尤其是第二次，派白晋任使节出使法国，在中西交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697年，白晋奉康熙帝之命，携带康熙帝赐予的49册汉籍等物回国觐见法王路易十四^③。但由于缺少一封康熙亲笔签发的文书，白晋未被法国认可其外交身份。然而白晋出版的《康熙皇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一时轰动欧洲，使得欧洲对中国的君主及国家模式有了更多的认识。此外，白晋成功地招募了马若瑟(Joseph-Henri de Prémare, 1666—1736)、雷孝思、巴多明、傅圣泽、殷弘绪等10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他们多为清廷所用，并翻译西学论著和儒家典籍，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论著，为18世纪的“中国热”拉开序幕，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使者

传教士通事具有多重身份，他们不仅在外交关系中扮演着译员、顾问、使节等角色，同时担任外语官学的教习，翻译西学论著、儒家典籍，是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桥梁、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使者。

① 参见《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载前揭《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3卷，第228—240页。

②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徐家汇馆藏书，第39页，转引自前揭张西平《跟随利玛窦来中国：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0页。

③ [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 外语官学里的洋教习

为摆脱中西关系中因语言而受到的掣肘，雍正七年(1729)，皇帝下令设立“西洋学馆”，由巴多明担任馆长，宋君荣为副馆长，教授拉丁语。首期挑选“万保”等内务府官员子弟20名，学习期间的待遇按照咸安宫学习之例给予。开馆三年后，已使学生拉丁语“说得相当不错”^{〔1〕}。除日常的教学之外，宋君荣还带领其中一些学生去见朗克，与David Kraf, Curlandois等人用拉丁语交谈。首期学生中，有13人被授予内务府笔帖式、库使、库守、柏唐阿等差。其中万保在内的六名优等生，还受命留馆帮助巴多明进行拉丁文教学。1741年，巴多明去世之后，由宋君荣继任馆长。乾隆八年(1743)，和硕庄亲王奏请取缔该馆，但仍有20人令宋君荣不时教演^{〔2〕}。该年12月，西洋学馆被裁汰，前后共存15年，招收了三批学生，巴多明、宋君荣作为主要教席，为清廷培养了一批翻译储备人才。

2.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使者

自明末以来，传教士便奉命编译西学论著。顺治元年，汤若望、罗雅谷编译的《天文实用》首卷完成，进呈皇帝御览。康熙帝即位后，虚心向传教士学习西学。南怀仁、白晋、张诚、徐日昇等人都曾担任过帝师。他们不仅编译了《几何原本》等作为御用教材，还曾奉帝命编撰各种科目纲要约18到20种。受此影响，五十二年(1713)，康熙皇帝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3〕}，精选八旗子弟入馆，选派传教士教授西方数学，翻译西方科学论著，进行天文、地理测量。康熙帝下令让胤祉、胤禄率领何国宗、梅穀成、王兰生、方苞、陈厚耀、明安图等人，在传教士纪理安、杜德美(Petrus Jartoux, 1668—1720)等人的指导与协助下，编纂历法、律吕、算法诸书，如《钦若历书》《数理精蕴》等。雍正时，戴进贤、徐懋德与何国宗、梅穀成、明安图等人重新修订编纂《钦若历书》，名为《历象考成》。乾隆年间，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等与允禄、何国宗、明安图等人编纂《仪象考成》。除天文、历算等书籍之外，传教士还曾编译有关医学、动植物学、艺术等学科的论著，如《钦定髀体全录》《狮子说》《进呈鹰说》《律吕纂要》等。

除奉敕编译西学论著之外，传教士通事也曾奉帝命研究中国儒家典籍，如白晋就曾奉康熙之命，研习《易经》。更多的传教士通事，特别是被称为“国王数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担负着传教与科学考察的双重使命，主动翻译儒学经典，以西文撰写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哲学和社会生活等论著，成为中学西传的主力军，如雷孝思著有《诸经说》，译有《易经》；冯秉正著有《中国之风俗习惯》，译有《中国史》《易经》；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史略》《大唐史纲》等，译有《书经》《易经》《礼记》《步天歌》。

三 传教士通事活动再评价

传教士通事是一个负有政治、外交、文化使命的复合群体。他们既服务于罗马教会在华传教，又行走

〔1〕 Antoine Gaubil.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1722-1759*. publié par Renée Simon,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70, p.316.

〔2〕 郭福祥《巴多明与清宫西洋学馆》，《紫禁城》1997年第4期，第23页。

〔3〕 韩琦《“格物穷理院”与蒙养斋：17、18世纪之中法科学交流》，《法国汉学》第4辑，中华书局，1999年，第302—324页。

于清代的宫廷，扮演着外交的传译、文化交流的使者等诸多角色。传教士通事活动的繁复，势必影响到他们翻译活动的复杂性。

在清代前中期的中西交往中，因清廷无西方语言翻译人才可用，传教士凭借其卓越的才能担任通事，承担口译、笔译等工作，充当外交顾问与调停者，奉命出使欧洲等事务，为中西交往的顺利进行付出了努力。如尼果赖使华时，南怀仁为译员，尼果赖曾对阿穆瑚琅表示：“感谢博格达汗为他派来这样一位翻译。他不仅能口译有关两个君主的所有事务，而且还能逐字逐句正确译出他们的称号和国书内容。”^{〔1〕}沙如玉在致韦塞尔神父的信中曾对巴多明充当翻译有所评述：“他始终以某种方式，在北京与莫斯科两个宫廷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问题上，充当调解人。正是他起草了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确定的合约条款，他将它们译成拉丁文和鞑靼文。”^{〔2〕}

传教士通事所编译的西学论著，同样对清代学术与中国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中国科技史研究大家李约瑟所言：“在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3〕}这些著作成为清代前中期所编纂的重要科学典籍的材料来源。通过这些著作，中国接触到了西方的新知识，如哥白尼、开普勒学说等，促进了中国的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同时，传教士通事或亲自参与或指导协助清廷官员进行天文、地理的测量等活动，都促进了中国天文历算、地理学的发展^{〔4〕}。

传教士通事对儒学典籍的翻译，对中国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书写，以及他们与欧洲学者的紧密联系，无疑对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欧洲启蒙思想的重要来源，并为欧洲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莱布尼茨与白晋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闵明我返回欧洲时，两人曾会面谈，莱布尼茨还出版了《中国近事》。有研究表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可能受到了中国《易经》的启发^{〔5〕}。巴多明、冯秉正、宋君荣等对中国历史的翻译与介绍，为欧洲的中国上古史之争提供了论据。中国历史的古老对圣经编年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动摇了《圣经》的权威，甚至导致孟德斯鸠“直接利用中国历史的长度来嘲讽基督教世界6000年说”^{〔6〕}。

毋庸讳言，因传教士通事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会，有着各自的立场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在充当通事的时候，也对中西交往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甚至于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清廷的情报，损害了清廷的尊严和利益。

〔1〕 [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64页。

〔2〕 同上；《沙如玉神父致韦塞尔神父的信》，载前揭《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4卷，第242页。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7页。

〔4〕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4页。

〔5〕 参见胡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孙小礼《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西平《莱布尼茨和白晋关于二进制与〈易经〉的讨论》，《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6期，第5—14页。

〔6〕 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1页。

传教士通事对不同国家使团采取不同的态度。如汤若望针对荷兰使团，多方阻挠。因荷兰为基督教国家，与耶稣会士的立场不同。于是，“他不择手段地中伤荷兰人。他预料，如果荷兰人在葡萄牙之后得到在中国的自由通商权，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将会破产”^{〔1〕}。当传教士面对葡萄牙使团时，则尽力周旋。如1678年，白垒拉使团来华，希求实现自由贸易。在比利时人南怀仁、意大利人利类思等耶稣会士积极游说和帮助下，康熙帝终于在1680年，“准在旱路界口贸易”，开放了香山至澳门陆路贸易的通道^{〔2〕}。

传教士通事之间，彼此并非和谐统一，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教派、不同国家的利益。临聘为通事之时，双方为各自利益，多有考量，或相互推诿，甚或更改旨意。如在“礼仪之争”中，罗马教廷传信部曾派遣非耶稣会士马国贤、德理格等入华。嘉乐使华时，马国贤、德理格与耶稣会士就因立场不同，就是否翻译康熙圣谕，遣人回奏教宗一事而争执不下。除教派不同所致的立场不同之外，传教士通事的行为同时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如马戛尔尼使华时，法国传教士与葡萄牙传教士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葡萄牙担心英国使团来访，如若成功获得新的贸易基地，将损害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被清廷任命为此次使团的葡萄牙籍传教士通事索德超、安国宁、汤士选多番阻挠，“利用各种机会挑拨离间，诬陷英国人”^{〔3〕}。而法国与葡萄牙因“保教权”之事，双方传教士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因而另两位法籍传教士通事贺清泰、罗广祥，就对英国使团在华期间多有帮助。他们甚至在翻译乾隆帝写给英王的两封敕谕时，擅自“加入一些对英王的敬语，还删去了带有侮辱性的语词”^{〔4〕}。

在中俄交往中，传教士通事在未被清廷所疑的情况下，私下与俄方人员接触，甚至将出入宫廷时所得机密告知于俄方。如尼果赖使华时，南怀仁就曾私下与尼果赖接触，并告知其清廷的外交政策等。先后曾六次来华的朗克，与多位传教士交好，并由此获得了诸多情报。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期间，巴多明承诺“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到（俄国的）利益”，并为俄方使者萨瓦牵线搭桥，收买中国大臣马齐^{〔5〕}。

与此同时，清廷对传教士通事的态度也颇为矛盾。一方面，因缺乏通事，不得不倚重传教士，并授予官职。如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授予张诚、徐日昇三品官职；马戛尔尼使华时，索德超、安国宁获赐三品顶戴，贺清泰获赐六品顶戴。另一方面，清廷对传教士也并非绝对信任，朝廷通常会选择不同的人去翻译同一份文件，相互对比查核。从上表所列即可看出，使团来华时，通常会指定两个及以上的传教士为通事。康熙后期，中俄往来文书的翻译，除用拉丁文通事之外，清廷也常用俄文通事，如小领催

〔1〕 [荷]包乐史著，庄国土、程绍刚译《中荷交往史》，路口店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2〕 黄庆华《中葡关系史》，黄山书社，2000年，第386—387页。

〔3〕 袁墨香《马戛尔尼使华与天主教传教士》，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5—26页。

〔4〕 前揭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第14页。

〔5〕 前揭[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第336—338页。

库西玛、雅稿、伊凡、尼坎等^①，试图摆脱对传教士的依赖。

就总体而言，在清代前中期，清廷颇多依赖传教士通事。直至晚清，即使清廷已经培养出不错的外交翻译人才，但自始至终，清廷还是完全没有考虑利用自己的翻译人员。进而言之，清廷从没有真正地重用自己培训出来的外交翻译人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这实在是中国外交译者的悲哀”^②。

四 余论

传教士通事是清廷因自身缺乏外交人才而产生的特殊群体，对传教士通事的理解与阐述当置于整个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评析。16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清廷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朝贡外交体制，天朝上国的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视所有来华国家为蛮夷小国，即他们是否来华，于清廷而言，无关紧要^③。康熙朝虽曾派传教士为使节去欧洲，但并无更深一层的交往。雍正朝遣使入俄，清官方史料中竟然未有记载。而西方国家寻求的是海外扩张与自由贸易，在当时实力相对强盛的清廷面前，虽极力抗拒清廷觐见的礼仪，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屈从。作为双方沟通桥梁的传教士通事，他们同时也是各个国家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常以自身的教派与国家利益为前提。在多方利益与权力的角逐下，传教士通事斡旋于中西关系中，扮演着译员、使节、顾问等角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言之，传教士通事的行为，实际上有可能左右历史的进程^④。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传教士通事事实上参与了中西方学术发展的历程。但相比于中学西传在欧洲的影响，受制于天朝上国的思想、传统的华夷之防，以及清代统治者对知识的掌控等原因，尽管传教士通事所译西文书目较多，但大多未曾付梓，仅仅限于在宫廷流传而已。上层士人与宫廷传教士通事虽也有交集，且部分士人曾奉命与传教士共同编纂科学论著，但他们多贬低西学，一度流传“西学中源”说，视仪器制造等为奇技淫巧，无疑降低了西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实际影响。但毋庸置疑，无论在中西外交，抑或是文化交流中，传教士通事这一特殊群体都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因为他们，中西双方得以相识。

[作者单位：陈宝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刘国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宋仁桃)

①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第16—22页。

② 王宏志《翻译与近代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③ 冯尔康《试析康熙乾隆三帝接受额葡英三国使节国书礼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1页。

④ 王宏志《作为文化现象的译者：译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第92页。